



## 首都功能疏解与区域协同发展

■文魁

一个产居和谐的城市不可能只有高端没有低端。如果北京只是一味疏解低端产业,周边也只是承接低端产业,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不但没有办法得到解决,还会继续拉大区域发展差距。

随着中央最高领导强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社会各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上。现在北京的疏解清单到底能疏解出什么成为各方面翘首以待的商机,北京也面临着新的历史定位。

对如何正确理解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决策,准确把握相关政策,以及正在酝酿出台的环首都经济圈的策划,笔者有以下观点。

一座城市的形成发展和运转必须有其基础性的功能,包括交通运输、公共设施、水源和食物的供应等等。一个城市作为首都以后又附加了首都核心功能,这是必须要加以区分的。北京的功能一个是城市基础功能,一个是首都所附加给它的核心功能,也就是北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除此之外,北京因其“首都”的地位衍生出许多新的非首都的核心功能,它不是首都功能所派生的,而是因为它是首都,所以具有区位优势,而这个优势又会衍生出一些新的功能,比如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等等。

在疏解城市功能的过程中,北京的城市基础功能不能疏解,其商业服务、水电气暖供应、交通运输等等功能都不可能疏解,因

为疏解了,会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城市安全;首都核心功能作为首都的必然功能也无法疏解,疏解了首都核心功能,北京也就不成其为首都。所以目前只能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我们首先要反思一下北京何以作大?第一是顺应了城市发展的规律,有客观必然性,全世界人口向城市集中,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出现是客观规律。第二,北京的特殊之处在于周边发展比较滞后,北京优势明显,所以资源向此大规模集中。第三,北京借力核心功能壮大了非核心功能。

非首都核心功能对北京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一,扩大城市经济总量,提升城市竞争力;第二,为城市增添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第三,扩大城市就业机会,提高市民收入水平;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是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些衍生的非首都核心功能,通过增加财政收入,为更好地实现首都核心功能和城市基础功能提供了财力保障,这是北京作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对于北京的城市功能疏解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非首都核心功能都要疏解,疏解的对

象应以北京的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不匹配的功能为主。疏解功能与外迁项目不能等同。非首都核心功能表现为很多项目,有的项目可以外迁,但是功能不能外迁;有的则是整个功能疏解,只留下部分项目,总之功能与项目不能完全等同。

从目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发展的立足点应该有所调整,有所反思。第一,我们必须从国家整体区域发展战略考虑;第二,一定要着眼于京津冀城市群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北京不能简单地将淘汰的落后产业迁往河北,其重要职责应该是利用优势带动周边的发展。

当前邯郸、衡水、邢台、石家庄等河北城市“绿色崛起”的概念非常清晰,河北各地都在强调环境污染的治理。此时,北京把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企业疏解给河北也并不符合河北的发展战略。北京周边省份应该立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主动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而不是守株待兔。

京津冀三方各自都要弄清楚他方需求,不要只是从自己出发,站在他方的角度考虑他方的需求,达到互惠互利双赢。

对于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的争论,我认

为“北京要发展高端产业,把低端产业疏解出去”的观点是需要反思的。高端产业也有低端需要,一个产居和谐的城市不可能只有高端没有低端。如果北京只是一味疏解低端产业,周边也只是承接低端产业,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不但没有办法得到解决,还会继续拉大区域发展差距。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就会继续增加北京人口聚集的压力。

所以笔者认为北京应该以高端技术和科技创新优势来帮助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展北京的科技转化能力,反映科技创新的价值,增加北京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实实在在帮助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可谓一举两得的双赢之举。

北京污染企业的外迁一定要有相配套的治污措施,在疏解的同时也要进行有效的污染治理。北京不能输出污染。要辩证把握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的关系,拥有大量高端产业的城市也有低端产业的需求,但是低端的业态完全可以高端化,最近北京有一些低端业态的小企业已经开始走向高端化,利用高科技和网络信息,低端产业也可以做高做强。(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中国金融外交的成功既有赖于国际层面的政治动员,也有赖于国内层面的金融发展。

## 中国外交中的金融外交

■李锐

随着全球化时代日益深度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越来越需要通过政府外交手段来保障自身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于是金融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逐渐在中国兴起。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活跃角色。

金融外交是指一国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具体执行部门,围绕金融事务,针对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所展开的官方交往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金融事务上的国际合作和有效治理,或者通过影响国际金融管理来实现其他目标。这种官方交往活动的内容主要包括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政策的协调、金融事务的谈判以及金融协议的签署等,其具体形式主要体现在跨国访问和国际会议。

金融外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核心事务展开:一是政府间的跨国资金信贷、短期的流动性供给;二是货币的国际使用和汇率的跨国协商。它们通常分别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直接负责,所以随着金融外交的大规模兴起,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开始成为一国政府对外交往活动的中央执行者,金融外交也因此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一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从事的外交活动。由于货币是金融的核心,狭义的金融外交因此又被称为货币外交。

金融外交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官方性。相互交往的多个行为体

中,至少有一方是中央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等官方代表。退一步讲,金融外交的行为体也必须是政府官方背景的非官方机构或带有明确官方目的私人机构。最典型的金融外交是中央政府主管金融事务的官员之间或是其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

第二,政治性。很多金融事务虽然是技术性事务,但是金融外交却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来源包括:(1)金融外交的执行主体是官方机构而不是商业机构,而在一个等级制的官僚体系下,官方机构的行为都要经历一个政治过程;(2)金融外交的目的通常包含超出金融范围的政治考量,即借助金融关系来实现其他目的;(3)金融外交的目标通常需要通过议题联系、外交压力、利益交换等政治手段来实现。因此,金融外交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为。

第三,交叉性。金融外交是外交和金融两个领域的交叉与结合,它同时对传统外交行为和金融事务治理都提出了挑战。金融外交的执行者一方面要熟知金融业务(包括金融政治学)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要掌握从事外交活动的基本知识,需要同时遵循外交和金融两个领域的基本规律。

如果说职业外交的出现使得外交成为一门高度专业化的活动,那么金融外交使得外交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日益产生超越经济关系之外的政治影响,有时甚至关涉战争与和平问题,因此金融外交日益成为经济外

交中最重要且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中国早期的金融外交可以追溯到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席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有限的金融外交主要集中在处理与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上。

从21世纪开始,随着中国日益深度介入国际金融关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双重刺激下,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外交。

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希腊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保卫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的实际需求,而且也首次彰显了中国的金融力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外交在过去五年里开始大规模兴起,在全球、区域和双边三个层次上都颇有建树,并成为中国整体外交中十分令人瞩目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全新的外交舞台上,由于自身的金融安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严峻危险,中国一改往日沉默的角色,开始质疑单方面建立在美元主导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以更加积极的态势倡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格局。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四个主要的新兴国家单独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协调彼此立场,以加强新兴国家在20国集团(G20)中的外交行动能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先后出台的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全面激发了中国政府关于如何减少美元依赖的思考。随后不久,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陆续出台,中国的国际货币战略从追随美元转向向平衡美元。而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走区域化的路径,特别是在东亚金融和货币合作的框架下进行,因此,中国的东亚金融外交开始全面发力。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成及其扩大,是中国金融外交在区域层面的一个重大成功。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还使得日本开始正视中国的金融实力,与中国共同分享东亚金融货币合作中的领导权。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的双重冲击之下,国际金融体系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即传统的金融秩序难以以为继,新的金融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入到一个实现从贸易崛起向金融崛起的新阶段,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大。

因此,中国金融外交将服务于中国金融崛起这一宏大目标。具体而言,中国未来的金融外交将继续致力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区域金融秩序构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这三个层次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金融外交的成功既有赖于国际层面的政治动员,也有赖于国内层面的金融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 时事漫话

## 电商屡陷“假货门”“内外监管”要跟上

■沙森

近日,聚美优品、京东等电商出现的“假货门”事件,在奢侈品、化妆品以及电商行业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事实上,这并非知名电商第一次陷入售假风波,公众对网购商品质量的隐忧一直伴随着网络购物兴起、发展的全过程。相比于传统的购物方式,网络购物B2B、B2C的销售模式的确实具有新的特点,但在“打假”这个问题上却与传统购物方式无异,无非是外在和内部的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电商在中国发展的十五年,官方有关部门的“打假”行动从来没有中断过。就在今年6月19日,国家工商总局还发出通知,决定于7-11月开展2014红盾网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通过互联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可见电商自身,无论是在供货商资质审核、产品质量把关还是处理消费者投诉等方面,显然具有更加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然而事实却是,对于假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乎成为行业内的共识。据媒体报道,制假售假普遍存在于各种给电商平台供货的公司,电商平台并非不知情。只不过这样的货物价格比较便宜,能给电商平台带来人气,同时又不是电商平台自己经营,就算被发现也能撇清关系,属于“互利利用”。说到底,还是牟利心态战胜了一切。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为了吸引消费者,部分电商平台,在选择供应商和进驻商家时,就会放松检验。事实上,即便不知道品牌商是否进行了授权,第三方的商品有没有假货,电商平台只需打几个电话,做几次检验确认就能一目了然。但对于部分电商平台而言,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对平台上商家的行为视若无睹。

不过对于电商来说,这种监管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以天猫为例,目前天猫有大约6万家商铺,经营着品类各异的产品,虽然天猫号称“假货零容忍”,采取严格的审核制度,包括对商家企业资质、行业资质、品牌及品牌授权资质、服务能力等进行系列审核,但实际上,假货的问题依然屡禁不止。电商平台监管难度高和监管成本大或许是两

大主因。试想,即使是6万家实体店,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保证不出假货,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而天猫上的6万家网上商店都是虚拟的店铺,并且散落于全国各地,经营的项目五花八门,其监管难度可想而知。作为一家电商平台,是否有能力对其进行有效监管,须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内在动力不足,外在压力就应该跟上。网络售假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也是导致假货现象的原因之一。目前,对于绝大多数的无品牌授权,通过自营渠道销售奢侈品的电商,国内并没有相关法律约束。一旦发现销售侵权商品、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经营行为,工商部门只能依据《产品质量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处罚力度非常有限。对于平台上第三方商家售假,电商平台通常的处罚也只是关闭网店了事。因此,仍有不少商家为了利润铤而走险。要杜绝电商平台上的假货,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电商平台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一旦出现售假行为,不仅要追究售假者的责任,还要



翟小芸供图

追究电商平台的责任,这样就会迫使电商平台把好渠道关,减少造假、售假现象的出现。

科技创新能力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潜力。因此,对科技创新进行有效管理和引导,促进本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是世界各国都置于核心地位的重要任务。那么,如何有效地管理科技以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有效促进科技的管理方式主要由三个方面因素所决定:一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趋势;二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和研发形式;三是本国的具体科技国情。

当代科学技术的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要求

粗略地讲,当代科学技术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趋势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一体化;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科学技术日益纵深交叉融合;三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及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结合;四是基于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需求不断催生新的科技研究领域。

第一个特征要求我们在进行科技创新管理时,必须要同时关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而不能仅仅重视新产品的开发这个最后环节。这不仅因为基础研究直接为后续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当代科学的很多基础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相应领域的重要技术突破。

第二个特征则决定了我们在科技创新的管理中,既要针对不同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给予重视和支持,也要对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给予高度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关注和支持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甚至更加重要,因为这种交叉融合不仅是新学科、新研究领域的生长点,而且往往会带来重大科技创新。

第三个特征要求当代科技创新管理必须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心态,必须从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视角去规划和设计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规划。在影响深远的大型科技工程项目的规划和审核中,也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维度考量其影响和后果。

第四个特征则决定了当代科技创新管理必须高度关注和支持社会生产生活中出现的新端倪及可能的发展趋势,对那些开创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对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处于毫末的“异端”给予支持,而决不囿于传统成见忽视这些“异端”。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支持处于毫末的“异端”,正是当代科技创新管理的核心所在。

当代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和研发形式的要求

当代科学技术的结构、高度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使得当代科技创新呈现出三种新的研发规律和研发形式:一是直接延展基础研究而实现技术创新的“延展型科技创新”;二是针对人们的潜在需求开展创新研究而实现科技创新的“创需型科技创新”;三是整合不同领域的创新成果而实现科技创新的“整合型科技创新”。当代科技创新的这些新的研发规律和形式,对我们的科技管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

科技创新延展型研发形式要求我们在科技管理中要破除对基础研究的既定成见,不仅要从事基础研究创新的维度评价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技术、应用和开发的维度来审视和考量研究成果的价值,要建立对基础性研究成果开展后续性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长效管理机制,以便从科技管理层面及时推动对基础性研究成果的应用和开发研究。

创需型创新研发形式的关键是针对潜在需求进行创新研究,这种需求往往是科技创新研发人员的创新引导出来的。所以,这种创新研发往往需要科技管理部门给予特殊的支持,需要科技管理工作具有开阔的思维、包容的精神,而不能仅仅以眼前的、可见的实用价值来评判科技研发项目。

整合型创新研发形式要求当代的科技管理必须打破学科藩篱,要求科技管理部门必须主动地搭建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进行综合性、整合性研究的科技创新平台。同时,在学科建制、学科设置和分子科学进行科技管理时,必须设立引导综合性、整合性研究的常设机构,规划整合型的科技研发项目,定期地引导和规划不同研究领域开展综合性、整合性研究。

基于我国国情有效开展科技创新管理

科技创新的管理还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国情、本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状态相结合,必须基于本国的既有基础和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我们认为,我国的科技创新管理必须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高度重视国家层面的重大科技创新规划,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体制的优势。科学技术研究是我国社会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各省市的科学院、各部委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各级各类公办大学等,既是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核心力量,也是重要的建制化力量,必须充分利用。

二是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科技创新管理中的作用。概括地讲,政府在科技创新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促进科技研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解决科技研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两张皮”问题;第二,建立合理的科技研发体制,真正让市场在科技研发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促进科技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第三,以合理的管理机制调动和引导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第四,建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机制,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

三是要充分发挥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我国的科技管理是高度体制化、系统化的,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建立起从上到下的一个完整的科技管理建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在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要想真正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在本辖区引领和组织科技创新研发的作用。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院长,哲学与科技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 提升科技创新的管理方式和水平

■刘高岑